借力数智技术 筑牢理想信念教育新阵地

□ 王 黎

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认知环境日趋复杂，思想诉求呈现多元分化特征。传统理想信念教育“大水漫灌”模式精准性不足、感染力不强的短板日益凸显，推动教育模式迭代升级势在必行。理想信念教育是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的关键抓手，将数智技术嵌入理想信念教育全流程，能够推动教育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求证，重构教育内容供给、实施载体与评价体系。因此，探索数智赋能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路径，对于夯实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数智技术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工具，但其本质始终是赋能手段，而非教育本身。

深挖数据 锚定教育靶向

深挖多源数据资源，借助数据分析研判精准把握党员干部思想关切与认知短板，是数智赋能理想信念教育的前置基础。一方面，搭建合规安全的思想数据采集渠道，整合线上学习平台留言、研讨发言、调研访谈记录等各类非结构化素材，利用语料分析技术对海量文本进行清洗归类，过滤无效冗余信息，剥离情绪化表述，提炼党员干部普遍关注的现实议题与思想困惑。另一方面，构建党员干部思想认知知识图谱，对梳理形成的热点议题与认知盲点进行标签化处理，厘清议题、困惑与场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刻画不同岗位、层级、年龄干部群体的思想特征。例如，对基层一线干部，重点梳理基层治理实践衍生的思想疑问；对机关干部，聚焦政策落实层面的认知难点，据此明确后续内容生产导向。数据挖掘全过程必须严守信息安全规范，杜绝过度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确保数据来源合法合规，筑牢技术应用的安全防线。

以往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设计多基于经验判断，容易出现供给与需求错位问题，难以精准回应不同群体的思想实际。通过数据挖掘实现对党员思想动态的精准感知，能够突破传统模式依靠主观经验研判思想态势的局限，推动教育内容供给前置对接干部真实思想诉求，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认知堵点，有的放矢开展思想引导，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为理想信念教育实现精准施教提供数据支撑。

场景赋能 创新教学供给

依托数智技术打造多元教学场景，拓展红色教育载体边界，是构建沉浸式、可感知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供给体系的关键举措。应摒弃单向理论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既有党员教育线上平台基础上，落地个性化内容分发机制，结合前期数据分析生成干部思想画像，改变同质化推送模式，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匹配理论解读、典型案例等学习素材，实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内容供给。同步运用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重构红色教育场景，推动各类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转译，如搭建虚拟纪念馆、复原重大历史事件情境等，使党员干部不受地域、时间条件限制，借助终端设备即可沉浸式回溯革命历史，体悟红色精神内核。还可嵌入交互式教学模块，在虚拟场景中设置情境化设问环节，引导学习者代入历史角色进行深度思考。需要强调的是，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必须严把AI生成内容审核关，健全内容审核机制，有效规避AI幻觉带来的内容偏差，坚决守住教育内容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数智技术带来的场景革新，冲破了传统课堂、纪念馆的物理束缚，把沉甸甸的红色资源变成可交互的掌上教学资源。它以生动叙事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穿透力，以沉浸式体验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代入感和接受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由“被动听讲”向“自发感悟”转变，真正提高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实效性。

评价牵引 校准教育成效

摒弃单向度的结果导向评价方式，构建多层次、动态化的数智评价体系，是持续提升理想信念教育质量的关键保障。首先，拓宽信息采集渠道。采取无感采集方式抓取学习任务完成质量、互动反馈、研讨成果等过程性数据，突破仅以课时完成率、试卷分数评判的固有模式。同步收集线下思想交流、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反馈信息，打通线上学习数据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关联链路。其次，建立党员个人学习画像。对学习行为、思想反馈、认知变化实施多维标签建档，画像重在描绘认知变化趋向，不作为干部考核的定性依据。再次，建立多元评价反馈闭环。将平台数据反馈、党组织评价、干部自我评价等信息纳入综合考量，全面评判理想信念教育的实际效果。例如，当系统分析发现部分干部对某一理论模块普遍存在认知偏差时，会自动向教育工作者推送预警信息，促使其及时调整优化教学内容。最后，预留体系迭代升级空间。需充分考量技术迭代带来的潜在风险，为评价体系保留升级接口，防止因技术更新过快导致整套评价系统失效。

这套动态研判机制把教育效果由静态的、一次性的评价转变为动态的、持续的跟踪与诊断，能够及时发现教育实施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进而倒逼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更新迭代，使理想信念教育始终契合党员干部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以数智赋能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要以深挖数据找准靶向为起点，以场景创新丰富教学供给为抓手，以多维评价提升育人质效为保障，贯通从需求识别、教学实施到效果反馈的完整链条。实践过程中，必须警惕形式主义、技术滥用、技术迭代等现实误区，决不能以技术手段替代思想引导本身。

（作者单位：中共鞍山市委党校）

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的逻辑机理与价值维度

> 外语课程思政育人须立足语言与价值的内在关联，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往中守正价值立场、坚持独立判断。

□ 万 菲 刘锦莲 魏思敏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外语教学不能仅局限于语言技能的训练，更应注重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人文素养及家国情怀，使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坚守价值立场、保持独立判断。教学中需持续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在知识传授中融入价值塑造，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语人才。本文立足外语教学实践，对外语教学课程思政育人价值的生成逻辑与价值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旨在丰富外语课程思政理论框架，为外语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外语课程思政育人价值的生成逻辑。首先，外语知识学习塑造价值认知。外语知识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词语含义及语篇结构均受文化环境影响，亦承载相应的行为观念与价值立场。因此，教师在讲授词汇与语法时，应阐明相应语言形式的适用语境和文化背景，引导学生辨析词语选择背后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取向，避免将语言形式与文化内容相割裂。在开展阅读与翻译训练时，教师可从叙述主体和事实依据入手，帮助学生区分客观信息与主观观点，并强调语义传递的准确性。在写作教学中，则应重视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与论证责任，要求学生依据可信材料组织观点。知识学习由此为价值认知提供了事实基础，价值判断亦能提升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课程思政唯有依托具体的语言任务，才能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体认表达责任，逐步养成审慎使用外语的习惯。

其次，跨文化语境深刻影响学生价值判断。跨文化语境不仅拓展了学生接触社会经验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的复杂程度，因而对学生形成稳定的价值立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语言材料中的人物行为和交往方式均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若忽视相关背景，学生容易仅凭既有经验作出片面评价。对此，教师可选取主题相近而叙述视角不同的材料，引导学生核查信息来源、辨析概念适用范围，审视不同观点的事实依据。网络媒介中的外语内容多以短视频或简短评论形式呈现，往往缺乏完整语境，情绪化表达更易干扰学生的认知判断。为此，应将信息溯源核验与语境还原纳入外语阅读教学环节。理解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判断，而是引导学生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辨识观点真伪，避免印象式判断，在开放包容的跨文化接触中守住文化主体意识，形成基于事实的价值认知。

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的价值维度。一是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表达能力。其核心是引导学生正确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能运用外语准确表达。学生长期接触外国文化素材，若缺乏用外语讲好本国文化的专项训练，易出现熟悉外来文化概念，却难以阐释自身文化内涵的问题，削弱其跨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意识。对此，教师可围绕教材主题补充中国社会生活与科技发展内容，让学生在查找资料和组织语言过程中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现象，将感性认识升华为基于事实依据的文化判断。外语表达过程本身即是对传统文化理解准确性的检验，只有当学生能够清晰地阐释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以平等、理性的方式回应外部疑问时，文化认同才能由一般情感沉淀为稳定的价值立场和扎实的跨文化表达能力。

二是教育价值——提升跨文化理解与辨识能力。跨文化理解要求学生厘清不同表达的形成条件，避免将个别现象泛化为某种文化的整体特征。在外语材料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跳出字面解读，核查信息来源、判断作者立场，考察结论是否具备事实支撑，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评判，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教师还可就同一议题的不同文本开展对比教学，引导学生辨析概念范畴与叙述立场的差异，通过查阅原始资料修正认知，避免由单一材料导致的判断偏差。需要注意的是，翻译软件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虽能高效处理外语信息，但其输出的内容可能缺失具体语境，甚至偏离原意，使用时须核对原文，并对概念转换和信息取舍作出独立判断。培养学生跨文化辨识能力，并非排斥外部观点，而是要在了解观点生成背景的基础上，依托证据判断其适用范围，阐明接受或质疑的理由。此类学习可帮助学生在开放包容与理性判断之间把握平衡，建立以证据为支撑的独立认知。

三是发展价值——培养专业责任与国际交往素养。外语能力与专业学习及职业发展紧密相关，语言使用者须对信息的准确性和使用后果承担责任。专业术语含义明确，翻译一旦出现偏差，不仅可能使相关技术要求被误读，还可能损害合作各方对任务条件和责任范围的共同理解。因此，外语能力评价不应单纯以表达流畅度作为标尺。在专业外语教学中，教师需引导学生养成术语核验与资料溯源的习惯，涉及数据、技术结论时，要完整呈现前提限定条件，避免因简化表达而随意删改关键信息。此外，国际交往还要求学生根据交流对象和工作情境灵活调整语言表达方式。面对分歧时主动核实事实，以恰当方式阐明观点，使沟通建立在信息清晰、责任明确的基础之上。因此，教师的课堂反馈除语法纠错外，还应关注内容准确性与交际得体性，引导学生认识语言选择对专业协作的潜在影响。只有将精准表达、文化理解与诚信审慎的沟通素养相结合，学生才能在未来学习及职业活动中运用外语妥善处理专业事务，塑造适配国际合作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单位：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以伦理与思政融合重塑医学课程育人格局

□ 黎永红

医学学科兼具高度专业性与鲜明的人文社会性，医者执业伦理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质量及群众生命健康权益。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医疗卫生行业对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求不已止于精湛的专业医术，而是更加注重医者的医德医风和人文情怀。医学伦理学作为培养医学生职业操守的核心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政育人元素，与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推动医学伦理学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既能弥补传统医学教育“重专业、轻人文、弱价值”的育人短板，也有助于培养顺应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的新时代优秀医务工作者。然而，当前不少医学院校在教学实践中，医学伦理教育与思政教育仍存在“平行不交融”的割裂情况，二者深度耦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尚未得到系统揭示。本文从理论、价值、实践三个维度，深入阐释二者相融共生的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现基础，旨在为医学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参考。

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的理论逻辑。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引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人文育人的核心课程，其育人内核与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从本土育人理论体系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二者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医德文化，共同构筑了相融共生的理论支撑体系。传统医德中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文化内核与当代思政教育所倡导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通。现代医学伦理的生命至上、公平正义、医者自律等主要准则，同样是新时代青年医务工作者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构成。

由此观之，二者在育人理念、价值内核、培养目标上形成内在互通、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从而构建起专业育人和思政育人协同推进的完整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医学人才人文素养和政治素养协同培育筑牢理论根基。

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的价值意蕴。推进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是顺应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涵养医疗卫生行业清风正气的必然要求，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正向育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人才培育层面，二者深度融合能够打破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文思政教育之间的壁垒，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融入医学专业知识传授和职业素养培育全过程，引导医学生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职业信念，避免陷入“重技术、轻人文”的片面育人误区，致力成长为兼具专业能力与高尚医德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在行业发展层面，新时代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责任意识和服务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融合育人模式能够不断砥砺医学生从医初心，涵养敬畏生命、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品德，为医疗卫生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后备力量，进而净化行业生态，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整体质量；在社会建设层面，医学育人成果与民生福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紧密相连，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可推动医学教育同健康中国战略需求同向而行，引导青年医务工作者自觉承担起公共卫生责任，践行社会公益使命，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长效发展和民生健康权益保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精神力量。

> 推动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是医学人才培养中“价值塑造”与“专业养成”深度耦合的必然要求。

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的实现基础。政策层面为融合育人提供了根本遵循。《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针对医学类专业明确提出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培育医者职业精神的要求，将生命伦理教育、人文素养培育和思想政治建设纳入医学课程核心育人范畴，是医学院校推进伦理教育和思政教育相融共生的重要指导文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则从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医学人才的人文素养和职业操守培育。一系列国家级政策层层衔接、互为支撑，既锚定了医学教育立德树人根本方向，又为高校推进医学伦理与思政融合育人在教学改革、课程重组、实践革新、评价改进等方面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教育实践根基为融合育人提供了实施载体。国内众多医学院校深耕课程思政建设，依托医学伦理学核心课程，联动临床见习、公益义诊、基层医疗服务等实践平台，实现思政元素和伦理教育的常态浸润。以西南医科大学的课程思政实践为例，其立足医学伦理育人视角，将一线临床案例、医者个人事迹等内容系统纳入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中，围绕公共卫生应急场景中生命救助、医患沟通、伦理选择等重点问题展开探究，推动专业伦理知识讲授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政策与实践共同构成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的实现基础。

医学伦理与思政教育相融共生，具备严密的理论逻辑、多元的时代价值与坚实的实现基础，是顺应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的育人新范式。二者融合能够让专业伦理教育与思想政治引领双向促进，打通医学人才专业能力和价值素养培养通道。未来，须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医学教育实际为基础，不断深化二者融合育人改革，优化育人路径，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医学人才，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医疗卫生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的人才动能。

（作者系桂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约研究员）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引领绿色生活风尚

>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与塑造绿色生活方式，一个指向发展的“含绿量”，一个指向生活的“含绿量”，二者最终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 姚 楠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更是打通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键纽带。二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绿色生活提供经济激励与供需支撑，绿色生活则为价值实现筑牢社会根基。为此，要以制度创新为牵引，统筹完善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与绿色消费政策，推动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协同，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色生活方式的经济逻辑所在。生态产品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其价值长期游离于市场体系之外，形成“保护者吃亏、受益者免费”的局面。生态产品普遍存在价值核算难、交易机制缺、补偿不到位等共性难题。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本质上是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补偿的经济效益，让生态保护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外部收益”显性化。近年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保护补偿、碳排放权交易、林业碳汇开发等实践不断深化，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开展的制度探索。当生态价值能够被精准“定价”，生态保护便从单纯的“道德义务”转变为可行的“经济理性”，为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提供稳定的内生经济激励。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激励与供给端为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支撑。从需求侧看，当生态价值得以量化并计入产品价格，绿色食品、低碳产品、生态旅游等获得合理溢价，“含绿量”真正转化为“含金量”，消费者的绿色选择便意味着更优的价值回报，绿色消费从而由“情怀驱动”转向“利益与情怀并重”。从供给侧看，价值实现机制拓宽了生态产业化的通道，保护良好生态的主体能够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获得真金白银，企业则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和清洁生产投入，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丰富的绿色产品。与此同时，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交易日益活跃，为绿色生产提供了市场化效益。碳普惠、个人碳账户等创新探索，让公众低碳出行、节约用能等日常行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兑换，绿色生活方式由此获得可感可及、持续不断的正向反馈。

绿色生活方式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深厚社会根基。需求牵引供给，消费塑造生产。一旦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风尚，其背后的海量需求将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绿色生活还意味着资源节约、环境低负荷，直接减轻生态系统的承载压力，客观上扩容了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让供给更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当亿万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便自然而然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生态治理的参与者，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与监督力量。生态文明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事业，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程度，决定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与深度。

二者协同共进，根本之策在于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完善核算标准、交易规则与补偿机制，畅通“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道，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试点经验，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实现路径。另一方面，要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政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金融、碳普惠等政策工具，降低绿色生活成本、提高绿色行为收益。同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和绿色市场，让生态产品供给与绿色消费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约束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个人自觉，推动多元主体同向发力，方能形成价值实现与生活方式变革的良性循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夯实绿色生活经济根基，以绿色生活方式涵养生态价值实现的源头活水，协同塑造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未来，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路径稳步前行，持续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宏伟篇章。

（作者系中共黑河市委党校讲师）